

ANDUO

LISHI

丹曲 ◎ 著



WENHUA

TANWEI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历史 文化 探微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多历史文化探微 / 丹曲著. — 兰州: 甘肃民族出版社, 2014. 9

ISBN 978-7-5421-2728-0

I. ①安… II. ①丹… III. ①藏族—民族文化—安多地区—文集 IV. ①K281. 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11118 号

书 名: 安多历史文化探微

出 版 人: 吉西平

作 者: 丹曲 著

责任编辑: 李青立

装帧设计: 王林强

出 版: 甘肃民族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)

发 行: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(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)

印 刷: 甘肃金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20 毫米 1/16 印张: 23.25 插页: 2

字 数: 357 千
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~ 1 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421-2728-0

定 价: 58.00 元

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或无文字现象, 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邮编: 730030 地址: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: <http://www.gsmnzu.com>

投稿邮箱: 448925720@qq.com

发行部: 张楠 联系电话: 0931-8773312 8773264(传真) E-mail: 993177333@qq.com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历史研究

藏族古代医学教育初探	(003)
祖国统一的历史丰碑		
——萨迦班智达在甘肃的足迹	(012)
黄明信先生与早期拉卜楞文化研究	(049)
试述当代藏族著名学者赛仓·罗桑华丹的学术实践	(060)

藏传佛教研究

试论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的传播	(077)
试论卓尼在我国藏区宗教文化地理中的位置	(112)
试论卓尼禅定寺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	(123)
卓尼禅定寺的组织结构及其文化传承概述	(132)
肃南藏传佛教名寺马蹄寺述略	(152)

文化艺术研究

从建筑、地名概念到文化概念的嬗变		
——“拉卜楞”(bla-brang)一词的文化诠释	(165)
卓尼禅定寺的佛教文化艺术考述	(178)
卓尼禅定寺的建筑艺术	(200)

灵相佛光

- 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 (219)
人神狂欢的大舞台
——热贡六月会考察纪实 (224)

文献释读

- 简述藏医学名著《四部医典》及其影响 (235)
藏文文献中的“李域”(Li - yul, 于阗)的不同称谓 (242)
藏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壮举
——《藏蒙大辞典》考略 (266)

调研报告

- 藏族文化的种类、特征及其作用 (281)
藏区文化设施建设调研报告
——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、堆龙德庆县和墨竹工卡县为例 (315)
藏区生态环境保护调查报告
——以甘南藏区为例 (331)
甘南州特色旅游业发展调查报告 (355)

后记 (367)



历史研究

藏族古代医学教育初探

藏族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枚瑰宝。藏医学的产生和发展,离不开教育这个极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。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,以求教于同道师友。

一、“口耳相传”的医学教育

医学是起源较早的一门科学。人类最早的医疗活动,原动力实际上就是人的自救本能。人们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,在劳动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,将以自救为主的医疗活动积累成为医疗经验,而这种经验积累,又使人们加深了对疾病的认识。经过漫长的认知过程,人们认识疾病、征服病魔的经验,日积月累,世代相传,逐渐丰富,便形成了与一定的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相伴生的各种古代医学理论。然而,在藏族的许多文献史料中,倾向于把藏医学的起源与佛教联系在一起,认为医学起源于释迦牟尼,他宣讲了各种医术体系,其中的一种是由不间断的医生体系继承下来的;它由印度创始,后来传到西藏。^①甚至认为,在人类生存的黄金时代,人们并不摄取食物,而是依靠“三昧”^②来过活的,有的文献中称,最早的疾病是消化

^①强巴格桑:《西藏医学问答》,《藏族研究译文集》(第二集),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,1983年,73页。

^②三昧:系梵文 samadhi 的音译,又译“三摩地”或“三摩提”,意思是消除所有杂念,专心一意于一境。这样,人们就可保持心神平静,杂念止息,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方法之一。

不良,最早的药是开水,而第一个医生则是梵天。^①如果剔除其宗教的内容,历史事实显而易见,它记述了藏族对史前时期医学的萌芽和产生的认识。

据藏文文献《五部遗教》(bkav – thang – sde – lnya)载,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,藏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,就已经认识到动物、植物、矿物的某些部分具有解除人体疾病的功效,认为“有毒就有药”^②。到了第28代藏王拉脱脱日宁协(lha – tho – tho – ri – snyan – shal)的时候,人们已懂得了用酥油止血、治烫伤、烧伤;用青稞酒通经活络,治疗外伤;用柏枝、艾蒿熏烟防治瘟疫病等^③。人们在与自然灾害、猛兽、疾病作斗争的同时,把积累的经验,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、发展,于是便形成了纯靠经验的早期藏医学。而这个经验积累和口耳相传阶段,也正是早期经验医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。

当然,在这个漫长的医学发展过程中,我们也不能排除苯教^④对藏族医学的巨大影响。如苯教创始人辛绕之子杰布赤西(dpyab – bu – khri – shes)就是个医道高明的人,苯教徒始终将他奉为藏医鼻祖。藏医中至今沿用大量的象雄文药名,这证明藏医学在松赞干布以前就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。它只能起源于藏乡本土,而不是印度文化的照搬。

总之,藏医学的形成源于人类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,藏医药学既不是佛教创始人“释迦能仁”所创,也并非印度医学的照搬,而是藏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。

我们将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划分为藏医“口耳相传”的教育阶段。

二、“祖传师授”的医学教育

吐蕃王朝的建立和发展,对发展和繁荣藏族的经济、文化奠定了良好

①日琼仁颇且·甲拜农桑:《西藏医学》,拉萨,西藏人民出版社,1982年,26页。

②欧坚朗巴掘、多吉杰博整理:《五部遗教》(藏文版),北京,民族出版社,1986年,499页。

③益希坚赞:《藏医发展的历史简介》,《西藏研究》1989年第三期。

④苯教:亦写作本教,本书统一用使用较多的“苯教”,后同,不再一一注出。

的基础。尤其是藏文的创制推广,对确立和促进医学的理论体系、普及传播“祖师传授”的藏医学教育,创造了尤为殊胜的条件。大批医药世家含辛茹苦、努力实践,将世代相传的早期医疗经验记录整理成文,以祖传师授的教育形式大力传播。

藏医学教育的发展,首先得益于文化交流。7世纪,唐朝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,文成公主带去了大批医药书籍和百工技艺人员。其中重要的医书是《汉公主大医典》。这些医著后来被唐代僧医马哈德瓦(ha-shang-ma-ha-de-ba)和达马廓霞(dhrma-go-sha)翻译成藏文,取名《医药大全》(sman-dpyad-chen-mo)。同时,应吐蕃赞普邀请入藏传医的唐朝医学家韩文海(hen-wen-han-de)与印度医学家巴热达扎(bha-ra-dhwa-dza)、大食(stag-gzigs)医学家噶林那(ka-les-nos)等人,汇编了综合性医著《无畏的武器》(mi-vjigs-pavi-mtshon-cha),在当时的西藏广为流传。入蕃的上述医学大师既是文化交流的使者,又是藏医学的主要传播者。

8世纪,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迎娶了唐朝的金城公主。金城公主入藏时也带去大批医药书籍。这些书籍由汉族僧医马哈金达(ha-shang-ma-ha-gyin-da)和加楚尕堪(rgya-phrug-gar-mkhan),及藏医琼布孜孜(khyung-po-tse-tse)、琼布丹次(khyung-po-dam-tshugs)、角拉门巴(lcog-la-sman-vbar)等人译成藏文,其中最重要的医著是《月王药珍》(sman-dpuad-zla-bavi-rgyal-po)。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也对藏医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,曾两次发布重大决策:一是从周边地区请来名医,引进医学;二是外籍医生培养本民族学生^①,这两项重大决策均行之有效。内地著名医学家摩珂衍那(ma-ha-ya-na)和塔希·东松冈瓦(mthav-bzhi-ston-gsum-gang-ba)就是所请名医中的佼佼者。他俩学识渊博,精通医道,释译了许多内地医著。东松冈瓦曾两次赴藏,被吐蕃赞普聘为王室医生,他挑选培养教育的九名聪明的孩子,后来成为“藏医九名医”,老宇妥·元丹贡布(gyu-thog-yon-tan-mgon-po)即是其中之冠,在藏医学教育史

^①黄颢:《唐代汉藏文化交流》,《藏学研究文集》,北京,民族出版社,1985年,205页。

上享有盛誉,功绩卓著。

8世纪初,老宇妥·元丹贡布出生在前藏堆龙地方一个医生世家,祖父、曾祖父都是吐蕃王室的医生。从5岁起,他就从父学习诸多医学经典,并随父兄奔走行医,先后治愈了无数病人。10岁时应赞普赤德祖赞之请至桑耶,与昌迪·杰涅卡普(brang - ti - rgyal - gnyer - mkhar - pug)等名医辩论,皆获全胜,从而位列西藏九大名医之首,被誉为“西藏第二医圣”。他曾多次游学印度、尼泊尔,拜许多名医大师研习了印、尼医学要典,返乡后往返于西藏各地,行医讲学,传授医理,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经验,终于以藏医学为基础,博采其他民族之医学精义,撰写了藏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典籍——《四部医典》,填补了藏医学理论的空白,成为千百年来广大藏医的教科书和行医指南,对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^①。他年近花甲时,到工布(kong - po)传授《四部医典》,300名学徒中,有50人获得“本然巴”称号,50人获得“然卷巴”称号,有50人获得“喇强巴”称号,约有100人获“喀朱巴”称号。此后在工布曼隆沟寺院收徒千余人,潜心传授、研究医学知识。其后辈均在藏医史上负有盛名,如新宇妥·元丹贡布(gyu - thog - gsar - ma - yon - tan - mgon - po)曾六次赴印精研医理,返回故里后,行医济世,广收门徒,传授医理,培养出德高望重者近300人,为藏医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
10世纪的仁钦桑波(rin - chen - bzang - po),既是著名的医典翻译家,也是一位医学教育家。他17岁赴印留学,历经10载,先后拜75位名师,谙通佛学、翻译及医学。回藏后翻译了马鸣论师的《八支集要》和迦湿弥罗学者的《集要广注·词义月光》等医著,不仅盛传于西藏,而且在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时传入内地。由于他学识广博,故藏区各地名医都集其门下,其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及藏区各地。门徒中最为著名者是娘迨·僧格扎、达支伊西、迥耐·翁曼阿叶、芒磨芒尊,四人并称阿里四大名医。还有西藏中部、北部出现的九大名医即夭茹、牙用波、苏玛曼、宇妥·甲噶多杰、木雅达扎、勃兰地·甲保、曲杰作聂、忽巴曲中、车杰大拉嘎等。他把藏医学的发展和

^①丹曲:《简述藏医学名著〈四部医典〉及其影响》,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》1987年第六期,88~91页。

传播向前推进了一步,在藏族古代医学史上,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

11世纪,出生在前藏沃如地方的扎巴·恩协坚(*grwa - pa - mngon - shes - can*),自幼出家,学习显密佛典及医学,后又随迦湿弥罗班钦·达瓦贡布学习医学。1038年秋,他在桑耶寺内发现了《四部医典》原本,使这部沉睡多年的医学巨著得以面世。他将医理传给卫巴·达玛扎巴,又经饶端·贡却嘉传给新宇妥·元丹贡布。他的儿子拉宗扎西巴桑、孙子索南益希坚赞,继其遗业,著述颇丰。其祖孙三代,学徒众多,在后来产生的藏医北方学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随着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广泛播传,医学事业发展迅速。吐蕃王朝崩溃后,藏族文化史进入学派鼎立、学术争鸣的历史时期。激烈的学术竞争,使藏医学者们也相互争鸣,各立门派,促进了医学事业的迅速发展,使藏医理论体系更趋完善。14世纪,出现了藏族医学史上著名的北方学派奠基人绛巴·囊杰札桑(*byang - pa - rnam - rgal - grags - bzang*),他从10岁起就随西藏、印度的著名医学大师学习医学理论。明朝敕封其为“大司徒”(*tavi - su - tu*),并赐银印。他所撰写的医学著作颇负盛名,其中《八支集要·如意宝珠》、《〈体则部〉论注·释义明灯》、《〈论述部〉论注·甘露河流》、《〈后续部〉释难·万想如意》、《医药宝匣》、《三百六十医法辨别》、《九绝症分辨》等医学论著,奠定了藏医学北方学派的理论基础,形成了藏医史上颇有影响的北方学派。以他和他的弟子弥易尼玛·统巴端登(*mi - yi - nyi - ma - mthong - pa - don - ldan*)为代表的北方学派,总结了“六边四法”的教学方法,培养出了许多名医,在藏医教育史上,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15世纪,西藏产生了藏医的南方学派。其奠基人宿喀·娘尼多杰(*zur - mkhar - mnyam - nyid - rdo - rje*)出生在塔波地区,10岁开始学医。曾与北方学派医学家弥易尼玛研讨医学问题,并撰写了《千万舍利》(*bye - pa - ring - bsrel*)等医著,随后又在后藏夏却恩噶寺(*shar - phyogs - mngon - dgav*)与诸多大师讨论医学,研究药物,并合著了《珍宝药物形态识别》、《药味·铁鬘》、《甘露之池》、《甘露宝库》等论著,总结了瘟疫病的治疗经验。从而奠定了藏医南方学派的理论基础,形成了与北方学派相提并论的流派,在藏医教育史上,功绩显赫。他培养了众多门徒比较有名气的就有60

多人。如其后裔宿喀·洛追杰波(zur-mkhar-blo-gros-rgyal-po)撰著了《祖先口述》等著名医学经典,终身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。

总之,在“祖师传授”的过程中,藏医学事业之所以能够大力向前发展,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有极大的关系。藏文的创制,为吐蕃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藏民族与其他民族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,使医学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,产生了大批优秀的医药学家,他们继承祖业,远涉四方,行医济世,弘扬医道,广纳徒弟,为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。

三、“学校”医学教育

随着藏族社会政教合一制度的逐步形成,藏医学也从“祖传师授”的教育逐步转化为以学校为中心的医学教育。藏医学校教育成为集中培养和发展医学人才、传播藏族医学的主要途径。

据藏文文献记载,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,“从印度请来山地嘎巴,从克什米尔请来古雅瓦赤拉,从唐朝请来东松冈巴、巴拉和尚和巴达,从波斯请来喀拉山弟,由古格请来僧多俄金,从多保请来其奥马茹子,从尼泊尔请来达磨沙拉,让这些被请到吐蕃的医生把各自的医书译成藏文,译著放在用儿茶合欢木(一种落叶乔木,我国西南各省有产,又称孩儿茶)制成的盒子里,训练一些聪明的男孩子来学习医学”^①。这便是藏医学校教育雏形组织。就从藏文文献来看,除了知道它培养了“藏医九名医”之外,关于这个教育组织的地点、名称、规模并无详尽记载。

据东嘎·洛桑赤列先生的相关著作中讲,8世纪中叶,“由宇妥·云丹贡布自己私立的巡回医师学校,是医师学校和私立学校之始”^②。另据《西藏医学》载,宇妥·云丹贡布曾在工布曼垅建立了一个“帝释天王城的医学院”^③。学校建立后,他一面搜集民间药方,采集药物,炮制成药,潜心研究

^①日琼仁颇且·甲拜衮桑:《西藏医学》,拉萨,西藏人民出版社,1982年,36页。

^②东嘎·洛桑赤列:《西藏教育发展史略》,《西北民院学报》,1986年第三期。

^③日琼仁颇且·甲拜衮桑:《西藏医学》,拉萨,西藏人民出版社,1982年,302页。

医药学,一面诊治病人,培养医务人才。由于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,他的学生后来多达千余人。到了 11 世纪初,大译师仁钦桑波“在阿里托林寺建立了一所妙法学校,九位名医等人的后期学徒发展的也很多了”^①。可见,藏医学校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。

历史上较正规的藏医学校教育始于 17 世纪。据第司·桑吉嘉措的《藏医史》(gso - rig - sman - gyi - khog - vbug)载,第五世达赖喇嘛不仅研读了《四部医典》、《甘露宝瓶》、《千万舍利》、《上区医生实验妙方》等医学名著,而且还撰写了《甘露宝瓶·净露明月之光》(vchi - med - bdud - rtsi - bum - pavi - rnam - dag - dbang - gi - chu - rgyun - gi - gsal - byed - bdud - rtsivi - zla - snang),刻印了先辈医学大师所著的大量医书抄本。不仅如此,他还委任尼塘仲钦·罗桑嘉措(nyi - thang - drung - chen - blo - bzang - rgya - mtsho)、察绒巴·才昂南嘉(tsha - rong - pa - tshe - dbang - rnam - rgal)两位大师分别在哲蚌寺的噶丹颇章西侧建立了“索日卓彭岭”(gso - rig - vgro - phan - gling 即“医明利生洲”)和日喀则的“章松堆贝岭”(drang - srong - vdul - pavi - gling 即“聚仙洲”)两所医科学校,后来又委任强俄·囊索达吉(byang - ngos - nang - so - dar - rgyal)和达蔓曼让巴·罗桑曲扎(dar - mo - sman - rams - pa - blo - bzang - chos - grags)两位医学大师在布达拉宫哈旺角创办了医药学院。五世达赖喇嘛关心学生学习,并在生活方面提供了便利条件^②。学校创立时,正值格鲁派势力与噶举派相互斗争最激烈的时期,刚刚有了起色的三所学校均遭到了战火的破坏,加之其他原因,不久就停办了。嗣后,第司·桑吉嘉措鉴于医药教育机构的衰落,于 1696 年在拉萨药王山创立了药王山医药学院,全名为“药王山琉璃利众神圣智慧洲”(lcags - po - rivi - beethurya - vgro - phan - lta - na - ngo - mtshar - rig - byed - gling)。这所学校初期学生 30 余人,后来增至 70 余人。学习内容除《四部医典》外,还设有《增补四部医典秘诀本集》、《草药密方》等科目。该校还制定了学业、学位以及奖惩等方面的教学管理制度,并制作了各种教具和教学图卷等。该校重视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

^①东嘎·洛桑赤列:《西藏教育发展史略》,《西北民院学报》1986 年第三期。

^②第司·桑吉嘉措:《藏医史》(藏文版),兰州,甘肃民族出版社,1982 年,367 页。

法,并规定学员每年外出采药一段时间,以便实地掌握草药的采集和鉴别知识。当时该校还拥有自己的供养庄园,经济上得到了优厚的照顾。该校存在了200余年。培养出了许多的医学人才,为继承和发展藏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18世纪初,安多地区的塔尔寺亦设置了医药学院。据《塔尔寺志》载,藏历第十二绕迥金兔年(1711年),第二世曲桑活佛罗桑丹贝坚赞(chu - bzang - blo - bzang - bstan - pavi - rgyal - mtshan)遵照西宁道的命令,授意塔尔寺堪布色枳·次赤仁青(ser - dris - tshul - khrims - rgya - mtsho)将密宗学院改为额木奇扎仓(aem - chi - grwa - tshang)即医药学院。木蛇年(1725年),新委额木奇念扎(aem - chi - snyan - grgs)为师,复收老少僧人数十名,新立“医药学院”,全名为“索日达吉央盘罗布岭”(gso - rig - dar - rgyas - ghzhan - phan - nor - bu - gling),意即“医明昌隆利他珍宝洲”。藏历火牛年(1757年)又委任卓班智达为该院住持并另立扎仓。从此,它逐渐成为安多藏区规模较大、影响较广的一所医学教育机构。该院设初、中、高三个学级,注重“经医双修”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修习方法。学僧重点学习《四部医典》等医学论著,兼修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等经典。从农历七月初二开始,全院学僧做六天夏季加持法后,到曲嘎日辍(山名)鉴别草木石类诸药及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的功效。学僧每年轮换闭关念修“本尊能怖金刚”、“药师佛”、“普明大日如来三十七尊”等三法的“堪能作业”法。学僧学完《四部医典》,可考取“曼然巴”称号。该院治学严明,培养了一批著名僧医,在安多地区颇有影响^①。此外,在青海的佑宁、广惠、夏琼等诸多寺院,也建立了医药学院。

18世纪末,闻名遐迩的拉卜楞寺也创立了医药学院。寺主第二世嘉木样·久美昂吾遵照六世班禅旨意,于藏历第13绕迥木羊年(1763年)仿照后藏扎什伦布寺时轮学院之制,在拉卜楞创建了时轮学院,少数僧侣组成其中一个班,专修藏医和密宗学科。后来随着拉寺发展形势的需要,嘉木样与檀越河南亲王征得七世达赖喇嘛同意后,参照拉萨药王山医学院之制,在拉寺建立了医药学院。学僧由原有的藏医班和从闻思学院抽调的部分僧人组成。

^①色多·罗桑崔臣嘉措:《塔尔寺志》(藏文版),西宁:青海民族出版社,1982年,207页。

藏历木龙年(1784年)医药学院正式竣工,全称“曼巴扎仓索日央盘岭”(sman - pa - grwa - tshang - gso - rig - gzhan - phan - gling),意即“医药学院医明利他洲”。由第七世达赖喇嘛和藏王颇罗鼐委派给河南亲王的著名藏医藏曼·益希桑布(gtsang - sman - ye - shis - bzang - po)及其高足多杰然卷巴(rdo - rje - rabs - vbyams - pa)和额木奇罗桑达吉(blo - bzang - dar - rgyas)等名医先后抵达该院传授医道^①。该院设门诊部和制药厂,最盛时学僧达200余人,有初、中、高三个学级。主修课为《四部医典》,注重教学实践,根据季节时令的更替进行有组织、有目的地授课、采药及炮制药物等活动。学僧修完各级课目,可考取曼然巴称号。其后,拉卜楞周围寺院如卓尼车巴沟寺、碌曲郎木寺、夏河美武岗察等很多寺院,也相继建立了医药学院。

由此可见,以寺院为中心的藏医学校教育,与当时藏传佛教强大的制约力和融摄力有极大的关系。尤其是18世纪后,格鲁派在清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在整个藏蒙地区确立了稳固的宗教地位。于是,藏医便成为寺院修习的重要内容。寺院理所当然地成为有组织、有目标、有计划地集中培养藏医人才的重要场所。

综观上述,藏族古代医学教育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兴衰的。它经历了“口耳相传”、“祖传师授”、“学校教育”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有着不同的性质特征,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风格。“口耳相传”的医学教育,为藏族医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;“祖传师授”的医学教育,确立和发展了藏族医学理论体系,开辟了普及医学教育的新途径;以寺院为中心的“学校教育”,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藏族医学的理论体系,使医学教育得到了广泛普及。这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,也就是藏医学教育体系从简单日趋完整的历史过程,也是其理论体系从单纯的经验积累到逐步确立和完善的发展过程。藏族古代医学教育为继承、发展悠久的藏医学文化遗产,广泛普及藏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(原刊《中国藏学》,1995年第四期)

^①阿莽班智达:《拉卜楞寺志》(藏文版),兰州,甘肃民族出版社,1987年,257页。

祖国统一的历史丰碑

——萨迦班智达在甘肃的足迹^①

河西走廊,是国际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,也是国际性的经贸通道和沟通世界文化的桥梁,更是我国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。曾几何时,在这个重要地域里,蒙藏民族的僧俗首领,共同树起了祖国统一的历史丰碑,完成了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的大业,为祖国的繁荣强大、民族的友好团结、文化的交流与昌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。凉州会晤,不但使元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而且也促进了藏蒙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,对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、维护祖国统一,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。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,诸多专家学者极为重视对萨班与蒙古阔端王在甘肃“凉州会晤”的研究,广泛搜集资料,锐意钻研,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论作,为今天我们完成这一课题任务创造了条件。鉴于这一历史事实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,1995 年初,甘肃省民委给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下达了题为“萨迦班智达在甘肃的足迹”的课题。从 1995 年年底至 1996 年初,笔者牵头带领几位课题组成员^②,先后赴天水以及河西走廊的天祝、武威、张掖、肃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,并结合藏汉史料,对萨迦班智达历史上在这些地区的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文章拟就萨迦教派产生的时代背景、萨迦班智达的生平以及萨迦教派的传承、萨

^①在进行此项课题的过程中,得到了武威地区民族宗教局、文化局,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、编译局以及武威海藏寺等单位和寺院的大力协助。同时也得到乔高才让、苏得华、卓俊才,李才让加、李天伟、郎慧琴、理智法师、张治虎、李生强等诸位领导和学者们的热心帮助和支持,在此深表诚挚的谢意。

^②“萨迦班智达在甘肃的足迹”课题组成员由丹曲、陈立健以及杨杰三人组成。